

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 編

中國哲學史資料簡編

清代近代
部分 下冊

中華書局



康有爲

康有爲，原名祖詒，字廣夏，號長素，又號更生，廣東南海縣人，生於清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死於一九二七年。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未就。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光緒召見他議變法，並把他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戊戌變法失敗後，出國組織保皇會。辛亥革命以後，又參加了張勳所領導的復辟運動，復辟運動失敗，保皇派遂瓦解。

康有爲是十九世紀後期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的前一年（一八五七年），英法聯軍侵入廣州，次年侵入大沽，又次年侵入北京，此後又經過中法戰役（一八八四年），中日戰役（一八九四年）。帝國主義的侵略逐步加深。一方面，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已經形成列強瓜分的局面；另一方面，初步發展起來的民族工商業，遭受了外國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的嚴重打擊。當時提出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是歷史發展必然的趨勢。因此，在國內出現了以康有爲爲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依靠光緒皇帝發動的變法維新運動和以慈禧太后、榮祿等爲首的頑固派反變法維新

運動的政治鬥爭。

康有爲原先從朱次琦受學，後來認爲朱次琦保守，獨立研求所謂經世致用之學。
「時時取周禮、王制、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及西國近事彙編、環遊地球新錄及西書數種覽之；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瓌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復閱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爲講西學之基矣。」（康有爲自編年譜）又後來更「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遊記，皆涉焉。」（自編年譜）康有爲不僅是接受和總結了其前驅如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人的變法維新的思想和從廖平接受過來的常州今文學派的所謂微言大義，託古改制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民約論、民主議會思想、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以及初步的自然科學知識。他以此來解釋公羊家「三世」的學說、禮運「大同」的學說，使「三世」、「大同」的學說，具有爲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服務的新內容。他的主要著作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禮運注、中庸注、論語注、孟子微、戊戌奏稿、大同書等。

這裏選錄了禮運注敘、禮運注一則、孔子改制考敘和上皇帝第六書。

康有爲改良主義的思想體系，一八八四年時已經基本形成。在這一年寫成的禮運注和後來寫成的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闡明了改良主義循序漸進的進化歷史觀，建立了改良主義變法維新的基本理論。在上皇帝第六書中，運用這種理論，結合當時形勢，提出了改良主義變法維新的政綱。

禮運是禮記中的一篇，其中大同章，是處在亂世的儒家，依託孔子把傳聞中原始公社的圖景加以描敘和美化而成的。這一美妙的圖景，長時期引起人們的嚮往和回憶，它對於現實的黑暗社會，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思想。歷代具有改革理想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多依託「大同」爲藍本來描繪其理想社會的圖案。康有爲更運用進化論的歷史觀點，爲禮運「大同」作了新的解釋，賦予了新的內容。後來把這種思想不斷擴充和修正，寫成了大同書。

康有爲在禮運注敘中說，孔子極其嚮往大同社會，「但以生當亂世，道難躋等，雖默想太平，世猶未升，亂猶未撥，不能不盈科乃進，循序而行，故此篇餘論及他經所明，多爲小康之論而寡發大同之道。」他在禮運注中解釋「大道之行」說：「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據亂世，而志則常在太平世，必進化至大同，乃孚素志。」他描繪他所理想的大同社會的圖景是：「無

貴賤之分，無貧富之等，無人種之殊，無男女之異，……無所謂君，無所謂國，人人皆教養於公產而不恃私產，人人即多私產，亦當分之於公產焉，則人無所用其私。……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與人大同也。」又指出人人皆公的理論根據是：「惟天爲生人之本，人人皆天所生而直隸焉，凡隸天之下者皆公之。故不獨不得立國界，並不得有家界，以至親愛不廣，且不得有身界，以至貨力自爲，故只有天下爲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他一方面運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把公羊家三世的學說和禮運大同小康的學說熔合在一起，建立了改良主義者循序漸進的歷史進化論的思想；又一方面運用「天賦人權」的觀點和空想社會主義的觀點，畫出了改良主義最高理想的社會輪廓——「人人皆公的大同社會」。他在禮運注敘中說，中國二千年的社會，「總總皆小康之世也」。中國二千年來荀卿、劉歆、朱子的舊學說，「總總皆小康之道也」。他暗暗地斥責了當時的頑固派，說他們「泥守舊方而不知變，永因舊曆而不更新，非徒不適於時用，其害且足以死人」。這就指出中國非變法維新不可。

康有爲所歌頌的大同社會，只是一種空想，「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道路」（毛主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一四七六頁）。但是，在革命派的運動尚未展開以前的歷史條件下，康有爲的改良主

義思想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因為他不僅具有愛國主義的熱情，還比較現實地認識了民族危機，認識了歐美資本主義社會比中國封建社會進步，並且認識了歐美資本主義社會，還不是最理想的大同社會（儘管這種認識很不徹底）。他的歷史觀是進化的。因此，康有爲在一八八四年發表的禮運注，在歷史上曾經起了鼓動變法維新和反對頑固保守的啓蒙作用。它是改良派企圖實行部分改革、實現君主立憲的理論根據。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爲在戊戌變法前一年（一八九七年）寫成的。它是「三世」進化歷史觀點的進一步的發揮，和前一時期（一八九一年）寫成的新學偽經考起着相輔的作用。新學偽經考是破，康有爲認為古文經全是偽造，是由劉歆一手偽造為新莽政權服務的。孔子改制考是立，立康有爲所認為由孔子託古改制所作，用隸書寫的今文經。前者之破，企圖使頑固保守派在學術上失去陣地，在理論上解除武裝。後者之立，企圖使改良維新派在學術上佔領陣地，從理論上把自己武裝起來。康有爲所謂孔子託古，託的是堯舜、文王。他認為堯舜「其人有無不可知，卽有，亦至尋常，經典中堯舜之盛德大業，皆孔子理想上所構成也。」（清代學術概論）所謂孔子改制，改的是亂世之制——周制（以康氏的邏輯，周制既是亂世之制，正可證明文王的神聖，是經過孔子美

化的)。孔子託古作六經，創造了一套理想中的新制，「據亂世而立三世之法」(孔子改制考敘)，就是從據亂世進入升平世；從升平世進入太平世，也就是從小康進入大同的新王之仁制。他結合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目標，運用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憲政和進化論的觀點，說：「治法進化由君主而及民主。文王爲君主之聖，堯舜爲民主之聖。春秋始於據亂立君主；中於升平爲立憲，君民共主；終於太平爲民主。故春秋始言文王，終道堯舜也。」(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十一)認爲文王是小康之王，堯舜是大同之王，文王、堯舜，都是孔子改制所假託的聖王。爲什麼改制必須假託文王和堯舜？他認爲人情「榮古而賤今」，改制是非常驚人的變革，不假託古人，就不能取信於今人。由此可以看出不必是孔子託古改制，而是康有爲託孔子之古而改制。必須指出，康有爲在這裏已經部分地修改了禮運注的觀點，禮運注說漢唐宋明「總總皆小康之世」，這裏却說魏晉隋唐以後，「並求漢人撥亂之義亦乖刺而不可得，而中國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孔子改制考敘)。在他看來，中國封建社會是據亂世還够不上小康；歐美資本主義的社會，接近升平世，才是小康；將來共產主義的社會，是太平世，就是大同。這種觀點，在大同書裏說得更明顯。他企圖實行君主立憲以漸進入歐美的升平世。這就是改良派學習西方，進行部分改革的基本理論。

康有爲在本文中，不僅把孔子神化爲兼受上帝意志，爲萬世制法的通天教主；還把自己神化爲兼受上帝意旨，直承孔子大統，爲中國變法的通天教主。這正說明康有爲的變法沒有人民羣衆的基礎，他是假託所謂上帝的意旨，而實際是依靠地上的神——光緒皇帝的意旨和所謂感通天地萬物的仁心，從上而下地進行不損害封建統治根本利益的某些變革，施行在封建統治範圍內許可的所謂「除民患」的仁政。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僞經考等書刊布後，震動一時，正統派的腐儒，頑固派的官僚，把它看做是「洪水猛獸」；而變法維新的開明士紳，則如獲至寶，例如梁啟超就把新學僞經考比作「颶風」，把孔子改制考和大同書比作火山的「大噴火」，「大地震」（清代學術概論）。可見它對戊戌變法運動所起的促進作用是巨大的。

上皇帝第六書作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即戊戌變法的前夕。這時德國佔去了我國的膠州灣，俄國佔去了旅順和大連，英國佔去了九龍和威海衛。亡國之禍，迫在眉睫，全國愛國人士都感到中國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局面。因此，康有爲在這書中，總結了波蘭、緬甸、安南、印度各國亡國的慘痛教訓，得出了「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少變仍亡」的結論。他又說：「夫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他強調變和新是普遍真理，這就是運用了

「三世」進化的歷史觀點。他警告頑固派說：「夫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車，未有不病渴而淪胥者也。」他又詰問頑固派說：「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與稍變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輕，殆不待辨矣。」這些沈痛的呼號，正反映了當時全國愛國人士迫切要求變革的願望。

但是康有為所強調的「全變」，不是從根本上改變封建制度，它只是區別於洋務派的變器（僅仿造西人的輪船大礮）而不變道（變道即變法）。康有為在這書中提出的政綱，恰恰就是他一貫強調的循序漸進的原則，一貫美化的君民共主的君主立憲，也就是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藍本的三權（議政、行政、司法）分立的君主立憲。在具體辦法方面，他提出了在制度局下分設十二局的計劃，其中包括有革新民政、財政、經濟、文教、交通、國防和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一些措施，使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皇朝新設的機構裏獲得部分參政的權利。他認為這樣，中國就可以救亡圖存，免去瓜分；就可以從據亂世進入歐美的升平世。這一改良主義的政綱，正反映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雖然遭到失敗，連君主立憲的局面也未實現；但對於揭露頑固派的反動面目，激起愛國人民的公憤，使人民取得反面教訓，更堅決地走革命的道路以

推翻封建王朝，廢除封建制度，却起了積極的作用。

從歷史發展來看，戊戌變法運動，是一九一一年資產階級舊民主革命前的一次改良式變革的嘗試。由於這是一個不改變封建制度的改良主義的政綱，由於封建制度早已過時，由於康有為停留在這個政綱上面而不能再前進，就使他後來倒退為反革命的保皇派。改良主義的政綱，在戊戌變法時期還是新鮮的東西；到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勢力成長以後，它就成為阻撓革命前進的絆腳石，就成為「舊則老」的腐朽的東西了！

禮運注敘

大漠也，鉅海也，泛之而無涯，行之而無途，杳杳茫茫，入之迷方，失路以悲，漂泊可傷者皆是也。浩乎孔子之道，蕩蕩則天〔一〕，六通四辟，其運無乎不在〔二〕。然以其曠博浩瀾，舉二千年之綿蘗〔三〕，合四萬萬人民之繁衆，並日本、高麗、安南之同文〔四〕，立於學官〔五〕，著爲國教，誦之讀之，尊之服之，而蒼蒼無正色〔六〕，渺渺無終極，欲實爲孔子之至道也，莫可得而指也。

人好其私說，家修其舊習，以多互證，以久相蔽，以小自珍。始誤於荀學之拘陋〔七〕，中亂於劉歆之偽謬〔八〕，末割於朱子之偏安〔九〕。於是素王〔一〇〕之大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令二千年之中國，安于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澤。耗矣哀哉！

予小子六歲而受經，十二歲而盡讀周世孔氏之遺文，乃受經說及宋儒先之言。二十七歲而盡讀漢、魏、六朝、唐、宋、明及國朝人傳注考據義理之說，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始循宋人之途轍〔一二〕，炯炯乎自以爲得之矣，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繼遵漢人之門徑〔一三〕，紛紛乎自以爲踐之矣，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亂也。苟止於是乎，孔子其聖而不神矣。既乃離經之繁而求之史，凡數千年國家風俗治亂之故，若者與孔教相因而進退者，得之於戰國、秦、漢之間。束漢爲美矣，以爲未足盡孔子之道也。

既乃去古學之僞而求之今文學〔一四〕，凡齊、魯、韓之詩〔一五〕，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一六〕，孟、焦、京之易〔一七〕，大、小戴之禮〔一八〕，公羊、穀梁之春秋〔一九〕，而得易之陰陽之變〔二〇〕，春秋三世之義〔二一〕，曰：孔子之道大，雖不可盡見，而庶幾窺其藩矣〔二二〕，惜其彌深太漫〔二三〕，不得數言而賅大道之要也！乃盡舍傳說而求之經文。讀至禮運，乃浩然而嘆曰：孔子三世之變，大道之眞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發之明而別之精，古今進化之故，神聖憫世之深在是矣。相時而推施，並行而不悖，時聖之變通盡利在是矣。是書也，孔氏之微言眞傳，萬國之無上寶典，而天下羣生之起死神

方哉！天愛羣生，賴以不泯，列聖呵護，幸以流傳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鴻寶發見，闢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以仁濟天下，將納大地生人於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豈不異哉！

康有爲乃獵纓敷衽，而正言曰：吾中國二千年來，凡漢、唐、宋、明，不別其治亂興衰，總總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國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劉歆、朱子之說所言，不別其真偽精粗美惡，總總皆小康之道也。其故則以羣經諸傳所發明，皆三代之道，亦不離乎小康故也。夫孔子哀生民之艱，拯斯人之溺，深心厚望，私欲高懷，其注於大同也至矣。但以生當亂世，道難躡等，雖默想太平，世猶未升，亂猶未撥，不能不盈科乃進，循序而行，故此篇餘論及他經所明，多爲小康之論而寡發大同之道，亦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耶！若其發禮意之本，極天人之故，抑可以擇先聖制作之意焉。

幼孩不能離襁褓，蒙學不能去嚴師。害飢渴者，當醉飽以濟其虛，不能遽與八珍；病傷寒者，當滌蕩以去其邪，不能遽投參朮。亂次以濟，無翼以飛，其害更甚矣。若子弟成人，尙必服以襁褓；寒邪盡去，尙不補以參朮。泥守舊方而不知變，永因舊曆而不更新，非徒不適於時用，其害且足以死人。今者中國已小康矣，而不求進化，泥守舊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樂羣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且孔子之神聖，爲人道